

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2022年系列学术报告回顾

彭菲

2022年,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参与组织了包括“第二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河南汝州温泉旧石器遗址论证会”等活动。

受疫情影响,原本计划组织的一系列学术交流、研讨和旧石器文化节、公众考古活动都因为疫情防控无法如期开展。新一届专委会领导一直思考如何在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络,活跃专委会研究氛围和增强委员凝聚力,推动学科发展。

经讨论,专委会决定自2022年9月起,在每月的最后一周的周三下午,定期组织线上学术报告交流活动,以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年度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收获为主题,邀请专委会委员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

9月28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系列报告之一“沙海寻踪水洞沟(2014-2022)”以线上形式首先进行,报告由专委会主任王社江研究员主持。专委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彭菲副教授代表水洞沟发掘研究团队介绍了水洞沟遗址自2014年以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和研究进展。

作为我国北方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水洞沟遗址自1923年第一次发现,发掘以来就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2003年至2007年的第5轮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但也提出了更多的学术问题。围绕该遗址的旧石器时代、石叶与石片组合关系、古人类认知行为等涉及现代人在东北亚地区出现、扩散的重大学术问题,2014年以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领队主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最重要的两处地点——第1和第2地点进行了第6轮发掘。

2014年至2016年对第2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批新的年代样品和文化遗物。在不同文化层新发现了更多鸵鸟蛋壳碎片、坠饰等遗物,经过重新梳理和测定该地点文化层年代序列,认为7个文化层埋藏年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43-35cal kaBP和35-30cal kaBP。对石制品的原料、微痕和初步技术研究也揭示了古人类复杂的认知和技术能力。

2018年,发掘工作转至遗址最为重要的第1地点。彭菲的报告介绍了最新的发掘设计、工作流程和工作进展,也展示了目前出土的部分遗物,并对第1地点石叶产品的埋藏层位、遗址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介绍,引起了许多委员和同仁对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现代人起源与扩散问题和遗址石器技术的高度关注,报告之后,与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此次学术报告为专委会的后续活动拉开了帷幕。

10月26日,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李锋研究员受邀成为第二次报告的主讲人,报告由彭菲主持。李锋研究员以“金斯太遗址与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石器技术扩散”为题,介绍了其团队发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原因、目标和最新收获。

金斯太遗址发现于21世纪伊始,2000年至2001年发掘出土了包括石叶在内的重要文化遗物,揭露了小石器工业—石叶工业—细石叶工业的多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其上还发现有青铜时代文化遗物。鉴于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器带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特征,对研究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石器技术扩散有重要意义,201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内蒙古博物院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在高星研究员的指导下多次在遗址进行了发掘,新的研究显示该遗址石器工业是目前发现的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工业技术体系。

2020年以来,李锋团队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通过改进发掘方法,引入并创新使用了许多信息提取技术手段,对遗址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发掘,并对过去发掘的出土物也进行了仔细筛选。考古队克服草原发掘的种种困难,获得了许多重要材料,特别是一些精美的装饰品和带有典型莫斯特工业技术特征的文化遗产物,对回答既定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在青铜时代文化层内的陶片、装饰品也丰富了该地区该时段的文化内涵。

11月30日,专委会特别邀请专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法岗研究员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概述”为题对泥河湾旧石器工作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对下马碑遗址的发现、研究进行了详细解读。报告由李锋主持,并邀请了谢飞、石金鸣、王幼平、高星等在泥河湾工作多年的专家参与。

泥河湾盆地被誉为“东方奥杜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许多重要的古生物和旧石器发现都来自这里。2022年,王法岗带领的团队在泥河湾下马碑遗址有了重大突破,相关文章也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Nature(自然)》杂志。

在2个小时的报告中,王法岗首先介绍了泥河湾的命名及地理范围,并回顾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泥河湾发现、发掘和研究简史。随后,他重点介绍了在泥河湾大田洼地区的系列发掘,包括马圈沟、半山、山岭—细弦子遗址群、侯家窑(许家窑)遗址、板井子、新苗庄、下马碑等耳熟能详的经典遗址和其他遗址的新发

现、发掘。

王法岗通过丰富的图片和资料展示了泥河湾考古的最新进展,也将泥河湾遗址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娓娓道来:这里既是东亚最早古人类的发现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现代人演化多样性最丰富的证据集中地之一,同时,在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人化石也为研究古老型智人的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最为重要的是,泥河湾的考古发现构建了从170万年至1万年之间近乎完整的区域文化演化序列,展示了东亚石器工业连续演化的生动场景。

报告结束后,石金鸣、王幼平、高星先后高度评价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性,也分享了各自在泥河湾盆地从事旧石器考古工作的经历,并对未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先生最后点评了讲座,他强调未来需要重视不同时段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并对青年学者提出期许,希望青年一代肩负责任,敢于攻关最早人类的来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重大学术问题。

岁末年终,回顾过去的一年,一些地区的新发现甚为亮眼,一些旧石器考古“新人”也正在把青春年华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了更好地展现旧石器专委会新力量的贡献,12月28日,专委会邀请到近年来区域系统工作较为突出两位专委会委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研究员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清波副研究员分别就各自进行的旧石器区域调查和发掘收获进行了详细介绍。

陈苇原本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但在长期野外工作中他善于思考和打破旧/新石器藩篱,最终对成都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了突破性贡献,他的研究兴趣也从新石器时代向前拓展到了旧石器时代。这也是对专委会一直以来呼吁打破“生土”,突破“旧/新石器界限”的最好响应。陈苇介绍了他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带着“寻找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乃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的学术问题,首先敏锐地发现了坛罐山这处典型的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类型遗址,该遗址出土有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镐等工具。这一发现将人类在成都平原的活动历史直接推至距今4000多年的宝墩文化推前至20余万年前。受此激励,陈苇所带领的团队对眉山、乐山等地进行拓展调查,又新发现了104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时也发现了莲花坝这一上部为细石叶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工作为成都平原早期人类活动找到了坚实的证据,也为川渝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和史前社会复杂化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材料。

从四川盆地回到中原大地,赵清波介绍了近年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新发现。鲁山仙人洞遗址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数十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河南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一些简单石片石制品,为研究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另一处温泉遗址则是一处面积巨大的旷野遗址,也是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赵清波多方呼吁下,在当地基建工作中得以保护下来,赵清波团队迄今已经发现了处于现代人演化时段内的超过3000件石制品。两位旧石器考古新人的精彩报告得到了点评专家北京大学夏正楷先生和高星先生的充分肯定。高星也对两个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前景给予充分肯定,在期待相关材料发表的同时,也号召更多年轻学子向陈苇和赵清波学习,以扎实的田野工作推动旧石器学科的继续发展。

2022年的四次系列报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专委会委员积极参加,一些高校学子和其他专委会成员也不时参与其中,每次活动的在线人数均超过150人。听众不仅有学习旧石器考古方向的学生,一些来自高校历史和相关专业老师也参与了专委会活动,并积极提问交流。曾经“冷门”“生僻”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也越来越多人对人类自身起源演化的兴趣,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好奇而走向更广阔的大众。针对许多学生听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专委会主任王社江向作报告的委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家的报告内容不仅聚焦于新的发现,同时还要重点介绍相关的学术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对学生群体的成长有更好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每次报告的时间因精彩的点评和热烈的讨论常常不断延长,相比传统学术会议和线下报告,这类专题性报告明显具有时效性强、受众范围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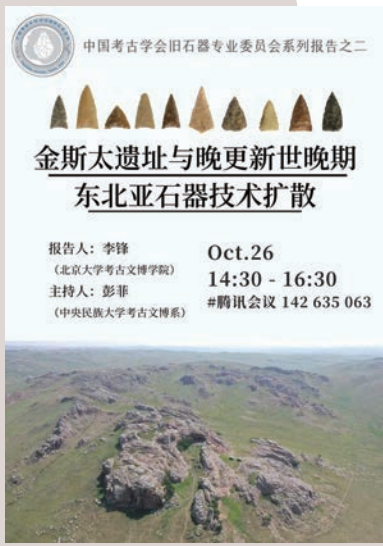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在高星、谢飞、石金鸣、王幼平、陈全家、王伟等上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温暖的集体,专委会组织起到了凝聚、团结委员的作用,同时在扩大学科影响力、科普宣传等多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并收到了考古学会的表扬。新一届专委会领导集体也将本着服务学科发展、提升组织活力、推动学术进步、推广科普知识的目标,在2023年继续把线上系列报告办下去,并组织更多的学术、科普和社会活动,以适应新时代飞速发展的中国考古学。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视点

旧石器考古有点意思

把考古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坛罐山旧石器遗址考古有感 任瑞波



坛罐山遗址远景

2023年1月10日,成都平原首次发现的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眉山坛罐山遗址在四川旧石器遗址新发现研讨会上受到参会专家的高度评价,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报道这一重要发现。

熟悉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学者都知道,虽然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并不缺乏旧石器时代遗存,如汉源富林、资阳鲤鱼桥、简阳龙垭、重庆铜梁、重庆桃花溪,但在成都平原,根本不见任何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线索。

2019年以前,成都平原最早史前遗存是德阳什邡的桂圆桥遗址发现的仰韶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后。换言之,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出现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国内外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未能在成都平原发现早于距今5000年以前的人类活动遗存。以至于有一种认识深入人心,即成都平原在5000年以前可能还是一片泽国,并不适合人类繁衍生存,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在成都平原内部能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而且还能早到距今二十万年前,这也难怪坛罐山旧石器在发现之初频繁遭受质疑。根据最新的发掘材料,笔者认为,坛罐山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打开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的“潘多拉魔盒”,为今后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的发现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21世纪的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和学术史梳理,要从坛罐山遗址起步。

2019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团队被派往眉山市东坡区坛罐山国际陶瓷艺术交流中心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偶然发现了可能有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线索。这信息对缺失旧石器遗存的成都平原而言,可破可立。

翌年1月,陈苇在四川省文物局专家评审会上对坛罐山遗址旧石器遗存做了充分解释,获得理解支持并计划开展小规模发掘。3月初启动发掘,至4月底,团队通过探方、探沟和北部断坎剖面相结合的方式,探方、探沟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存,并且在多个层位出土,尤其在早期网纹红土层位仍出土石制品,这一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不过,因为石制品“不太典型”甚至“不典型”,前来指导工作的专家多持质疑态度,否定了坛罐山遗址的旧石器遗存。

同年5月初,笔者有幸参观该遗址和出土石制品,直观印象是部分发掘出土石制品确实“不典型”,但属于人工制品是确定无疑的,何况有一部分打制石器较为“典型”,整体属于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系统。最重要的是,除晚期遗迹和表土层中出土的石器外,所有的石制品都有明确的考古出土层位和多种形式的记录。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外界质疑不断,考古团队仍得到四川省市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排除干扰,埋头苦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20年11月6日迎来了正式专家论证会,得到了高星、王社江、周振宇等国内旧石器考古专家的肯定,与会专家认为坛罐山遗址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是成都平原内发现的首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应该引入多学科和科技手段继续做发掘,并做好保护利用。至此,质疑消除,尘埃落定。

有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的100多年内没有人在成都平原找到旧石器,凭什么坛罐山考古团队就能够确定。抱着学习的态度,从2020年5月至2021年6月,笔者断断续续参与了坛罐山遗址的田野发掘和旧石器调查工作,这一经历正好可以回答上述疑问。

变“无意”为“有意”

坛罐山遗址在发掘之初,是一处基建考古项目,主要任务是清理几座早年盗扰严重的汉墓。在调查勘探期间,为避免漏勘墓葬,陈苇要求全面勘探。同事匡汉斌“无意”在表土层下,第②层土表勘探到石头,索性用兵铲取出来看,他感觉有些奇怪,便“有意”拿给陈苇观察,陈苇认为这应该是一件砍砸器,马上清洗、拍照,请旧石器考古同行确认,认定属砍砸器无疑,但出土层位有待发掘时再确认。因此在发掘期间,按领域要求,队员和民工格外留意每一处堆积层位中发现的石块,任何一件石头都要进行系统记录;发掘到“生土”后要继续下作,看能否继续发现石制品;同时还在坛罐山北部“有意”清理约8米高的断坎,全面了解该处的第四纪沉积物。当坛罐山遗址旧石器遗存得到最终确定后,发掘团队便在成都平原“有意”主动寻找年代更早和年代更晚的旧石器遗存,以期



坛罐山遗址出土的旧石器

大致了解它们的埋藏特征和年代框架。吉林大学赵滨福教授曾经讲过,考古学的进步依靠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考古新材料”,二是“考古材料新发现”。前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意”发现,一种是带着学术思考和目的“有意”去寻找。坛罐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无疑是将“无意”变为“有意”的典范。

变“被动”为“主动”

坛罐山遗址发掘之初,关于石制品人工属性问题屡次被部分同仁否定,局面非常被动。但凭借对旧石器考古过硬的专业嗅觉和在四川省内两次主持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实践经历,陈苇坚信自己的学术判定是正确的,而这种底气来自他本科在四川大学、硕博在吉林大学接受过系统的考古学专业训练。特别是在吉林大学求学期间,他主动选修了陈全家老师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跟随旧石器专业同学参加打制石器模拟实验。当坛罐山旧石器遗址最终被认可之后,积极参加2021年国家文物局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举办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高校研修班”,进一步学习旧石器考古最新的方法、技术和理念。学习结束后,立刻将学习内容、方法分享给团队成员。从新石器领域到旧石器领域,表面上仅是一字之差,但跨界之难度非常人能所想。在坛罐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团队主动采用“新”“旧”结合的田野方法,将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理念和方法融合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中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另外,坛罐山遗址在2020年度发掘过程中,资料整理工作同步跟进,田野工作结束不久,发掘简报即已完成,已正式刊发于《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

变“一”为“多”

从坛罐山遗址发现旧石器遗存线索开始,考古团队不断精心设计各种合理和可行的发掘方案,在严格坚持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联合国国内多家高等院校所进行共同发掘和研究,同时邀请地质、环境、第四纪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到发掘和调查现场进行指导。同时,本着“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在发掘期间,主动向同处成都平原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同仁介绍调查发掘经验和成果;利用周末和零星假日时间,团队跑遍成都平原眉山、乐山两地进行史前考古专项调查。截至2021年末,调查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点已经达到104处,采集到石制品超过1000件。

2021年5月,西南科技大学梁斌教授应邀来眉山实地考察十余处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出土石斧的陈沟村遗址引起了梁老师的注意,根据他对成都平原第四纪地质的前期研究成果,初步认为该遗址较坛罐山遗址的年代可能更早。兴奋之余,他有感而发:作为地质学家,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保障能源安全,保障洁净地下水和矿产资源的持续供给,因此他们践行的理念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没想到考古学家也是为摸清深埋地下的文化遗产,树立文化自信,把考古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当今奋战在中国考古学田野的队伍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坛罐山遗址考古团队只是一个普通代表和缩影。这样的考古团队越多,中国下一个百年的考古定会越发精彩!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